

# 医生自带三无进口修补材料 两次手术后她变成高位截瘫

## 8年漫漫维权路,连云港这对老夫妻终于胜诉



于智胜自制的康复训练机,每天都要练习两次

### 维权

#### 区消协秘书长:只剩一条路,上法庭!

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后,于智胜细想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开始频繁奔走于两家医院,然而两家医院都不愿意承担责任。

2001年,几乎走入绝境的于智胜找到时任连云港市连云区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家茂。

“谈到妻子瘫痪,这个大男人眼眶立即红了,悲伤、气愤交加。”张家茂回忆。于智胜问他,消协能否介入调解。“你怎么不早来呢!”张家茂一拍大腿,立即答应。从那时起,他便和朱新民、于智胜夫妇一起,踏上了这条艰辛的维权路。

了解了事情详情后,张家茂和于智胜立即找到连云港和南京的医院,但院方态度坚决,“这个由医疗部门解决,你们解决不了。”他们只剩下一条路。“我们把这个案子移交给了消费合议庭,通过诉讼处理。”

那时,连云港市连云区消协和连云区人民法院刚刚成立消费维权合议庭,朱新民的这起案子,算是法庭接手的第一起案子。

2002年,诉讼程序正式启动。由于于智胜以医疗责任事故为原因进行诉讼,因此必须经过中华医学会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然而,从连云港市到省里的终审鉴定,两级委员会在看完材料后都认为,这件案子不适于医疗责任事故。张家茂不甘心,又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联系到更高一级的中华医学会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委员会,但对方依旧维持省里的鉴定。

“2004年初,江苏省中华医学会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报告下来,我们都很失望。”对于一遍遍燃起希望,又归于绝望的于智胜来说,他已经心灰意冷,准备放弃。

#### 拿不出“三证”,两家医院合赔70多万

“肯定有个环节出了问题。”张家茂没有放弃。撤诉后,他思索了很久。最后把突破口,放在了专家带来的进口材料上。

“当时开始维权的时候,我就让于智胜把医院所有诊断报告拿到手。”事实证明,这些材料并没有白准备。在几百张病历以及相关证据材料中,张家茂拉着于智胜,开始了新一轮搜索。他们最终找到这一材料的发票,说起来是进口产品,但开具发票的,却是武汉高新区的一家公司。两人一下看到了希望。

张家茂立即联系了连云区消协,和武汉市消协、武汉市工商局一起,查找这家公司,结果却发现,这家公司从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过。之后,连云区消费合议庭又专门派人到武汉调查取证,确认高新区确实没有这家公司。

“武汉市工商局当时打电话给我,说‘没有这个公司,是个假公司’,我激动坏了,立即打电话告诉于智胜,

他也激动得语无伦次。”

没有丝毫耽搁,两人立即以医疗器械产品涉嫌假冒为主要原因,提起了第二次诉讼。

这场漫长的官司从2005年,一直打到2009年。于智胜要求两个医院提供3份证明,一份是医疗器械产品入关证明,第二是产品的安全许可证,以及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结果,两方都不能提供。最终通过连云港市连云区和市人民法院两审裁定,判定两家医院败诉,由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底,朱新民和于智胜拿到了70多万的赔偿款。长达8年的漫漫维权路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因为维权成本高、取证难等问题,像这样“告到底”的成功案例并不多。张家茂说,去年一年,整个合议庭受理投诉1700多件,几乎全部被调解掉了,成功率接近100%,只有3件移交给了消费法庭处理。

### 经验

#### 8年漫漫维权路,摸索出维权经验

3月12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来到于智胜家中,坐在轮椅上的朱新民正在用一只手慢慢地择着女儿买回来的豆芽,“就剩右手的两个手指能动,其他都僵住了。”朱新民把左手从手套里拿出来,很明显,手已经变形。

大小便失禁,于智胜就买来了尿不湿,每天定时定点抱妻子去厕所,当然,每天固定的3个小时康复时间也是雷打不动的。

“我最感谢的是我老公。”朱新民说,生病时,她才45岁,女儿还在上高中,“本来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我倒下了,就剩下我老公了。”

8年维权路,于智胜和妻子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很多人都劝我们算了,说劳民伤财,但我们觉得一定能赢。从区消协,到市消协省消协,从区法院到市中院,从市卫生局到省卫生厅,从连云港的医院到南京乃至上海的医院,8年来,于智胜跑遍了所有他能跑的。

## 315 维权 白皮书 故事

### 案例

3月12日下午,在连云港港口边的一个小区里,67岁的于智胜正在帮62岁的老伴朱新民按摩腿部,随后,他又将老伴从轮椅上抱起,架到自制的康复训练仪器上,跷跷板一样的装置,于智胜左右脚轮换踩着,老伴的腿也就跟着左右“抬起”。“你看,这么多年,她腿都没萎缩。”

1997年,45岁的朱新民觉得两腿又麻又胀,便到家门口的连云港某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脊髓瘤。

6月8日,这家医院请来南京市某医院的一位主任专家主刀,进行手术。术后,脊髓留下一个小洞,主刀专家用自己带来的一种修补材料贴上去,用于修补受损的硬脊膜。

没有想到的是,术后第三天,朱新民就开始发烧,并伴有剧烈头痛,高烧两个月后,家人又带着她辗转于南京和上海的几家医院,最后被诊断为髓内霉菌感染。经过抗霉菌治疗,病情渐稳定,但高位截瘫已不可避免。

2001年,心有不甘的于智胜来到连云港市连云区消协投诉,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妻子,一边还到处为心中的委屈奔波,2009年8月,终审判决书下达,朱新民和于智胜胜诉,连云港市某医院和主刀医生所在的南京某医院共赔偿71万余元人民币。

8年,于智胜从工作到退休,女儿成了家,外孙子也出生了,就连诉讼中的连云港某医院也已合并,更名改姓。“8年,就为了心中的这一口怨气,不然憋在心里,难受。”



材料整整铺满了一桌子,于智胜说:“这条维权路,整整走了八年。”

### 不幸

#### 脊髓瘤手术 南京主刀医生带去了“德国进口”修补材料

看着眼前的蓝色大文件夹,于智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材料我永远都不会丢。”

事情要从17年前说起。突然的腿脚发麻以及腰部疼痛让朱新民来到了家附近的连云港市某医院,CT检查后,被诊断为胸椎脊髓瘤。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该医院表示可以请到南京某医院著名的神经内科主任来主刀,这让于智胜放了心。

虽然脊髓瘤只有花生米大小,但长在脊髓上,拿掉后,势必会留下一个洞,这个洞如果没有填补好,就会造成脑脊液外流。

手术前,主刀医生来到连云港,并带来了从南京拿来的修补材料,“他说是德国进口的,名字叫‘特可靠’,让我们放心。”随后,于智胜将571元现金交给主刀医生,这名医生也带来了事先

开好的发票。

据主刀医生表示,手术很成功,术后两天,朱新民之前的症状全部消除,但第三天开始,朱新民开始高烧,头痛,由于主刀医生已回南京,病床医生诊断为术后热以及感冒,按照一般炎症进行治疗。

但之后,朱新民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晚上都不能入睡。”在拖了20多天后,于智胜带着妻子来到主刀医生所在的南京某医院,核磁共振显示,该修补的地方没有补好,脑脊液流出,形成了一个囊肿。

同年9月,朱新民进行第二次手术,主刀医生将第一次用的修补材料揭掉,将朱新民自己的肌肉贴了上去。本以为这次应该“大功告成”,但术后没几天,朱新民的伤口又开始流液体,“又漏了!”

#### 两次手术,朱新民变成了高位截瘫患者

为了止住伤口不断渗出的液体,医生让于智胜帮忙按压,“我拿手指按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按好。”

这之后,医生在朱新民位于背部的伤口上贴上厚厚的纱布,并让其平躺压着,五六天后,伤口是长好了,但朱新民的两条腿却抬不起来了,本还可以自己下地行走以及上厕所的朱新民突然就躺在床不能动了。

“就是这次手术之后,病情开始急转弯。”时隔17年,于智胜仍然有些激动,“神经旁边的

肌肉都粘连了,神经都粘住了!”

从此之后,朱新民的状况就一天不如一天。随后,于智胜先后带妻子去往南京以及上海的大医院进行检查,1999年10月,上海一家医院的专家通过手术发现,朱新民的伤口部位已经像臭水沟一般,而颈椎里还滋生非常多的霉菌菌丝……

将霉菌清理干净后,朱新民很快就退烧了,“什么都好了,就是腿不能动了。”

胸部以下毫无知觉,大小便失禁,朱新民被诊断为高位截瘫。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文 李雨泽/摄